



“甬温线7·23特大事故”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为主持了一场备受争议和质疑的发布会,再次将新闻发言人这个敏感岗位推到聚光灯下。

几天后,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发表致王勇平的公开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王勇平的表现,同时强调这场新闻发布会本就不应由王勇平独自担当。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三年的王旭明却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他最近所写的《致勇平兄的一封信》、《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等公开信,让人们从更自由更客观的角度看待新闻发言人这个虽已全球化、职业化,却仍带有些许“中国特色”的特殊角色。

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做?如何既让领导满意,又能成为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如何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舞跳好?本报记者与曾经的“个性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话,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戴着镣铐未必跳不出好舞”

对话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8月5日,王旭明在北京某区新闻发言人培训会上点评。

“总理可以开记者会,部长为什么不能”

齐鲁晚报:最近,连续出现像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故宫瓷器被损、7·23温州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使新闻发言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指责的对象,您觉得,为什么总是新闻发言人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性质就是在发生事件时,负责澄清事实和表态。因此他们成为事件的焦点也不稀奇。新闻发言人可以是政策的发布者、信息传播者,也是救火队员、道歉者。

齐鲁晚报:但是这几次公共事件中,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表现都感到不满。

王旭明:也许我应该为新闻发言人辩解一下,不是所有内容都应由新闻发言人发言。比如这次7·23温州动车事故发布会,我坚持认为,铁道部召开这场新闻发布会,就应该部长出来,在事故现场召开。我们应该学习总理,总理到了事故发生地就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理可以这样,部长为什么不行?

齐鲁晚报:是,温总理在这次7·23事故中,包括以前的汶川地震都是在现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王旭明:所以我郑重建议,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主要领导,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参加新闻发布会,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如果不能面对,你要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且由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官员出席。

齐鲁晚报:公众也是希望在这种场合,能由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出面解释,这也更有公信力。

王旭明:其实“一把手”出面,这只是一个表象。“一把手”出来背后的深刻含义是——就像我们老领导赵启正先生说的,你必须把工作做好,如果工作没有做好,就靠新闻发言人,就靠嘴去说,

那效果就非常有限。

比如说你工作没做好,你让新闻发言人去堵枪眼,实际上也堵不住。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你把没做好的工作说得很动听,那就不是事实。把工作做好,是新闻发言人发好言的前提和基础。

齐鲁晚报:在这次7·23事故中,我们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上级不愿意公开,或者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从而导致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不被公众接受?

王旭明:肯定是有。对于某些官员来说,信息公开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利益的缺损、个人名誉和地位的动摇。公开还意味着为官习惯的改变。

齐鲁晚报: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该怎么办?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仅凭一张嘴是无法满足公众要求的。郭美美、故宫瓷器、7·23事故等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会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齐鲁晚报:这样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发布会岂不成了应付公众的一种形式?

王旭明:我只能说,我们党和政府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是针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更是对各级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不重视新闻发布制度,或者只表面重视新闻发布制度,你让新闻发言人重视新闻发布制度,这是天大的笑话。

“新闻发言人要走职业化道路”

齐鲁晚报:您理想中的新闻发言人是什么样子?

王旭明:咱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我最欣赏的甚至崇拜的,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最近几年他代表政协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言,每一次都堪称经典。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现在一些新闻发言人还是存在欠缺的?

王旭明:就是缺少自己

的话。难就难在当新闻发言人,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现在在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齐鲁晚报:需要学习如何说自己的话?

王旭明:现在,我觉得最实在的就是学会怎样面对公众和媒体讲话。人的一生千万不能只会对家人和同事讲话,还要对公众和媒体讲话,这是一门学问,需要学习。有一位美国学者,他说,在当代,你不要关心你说了什么,你要关心人们听了什么。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只重视说,不断地说,而对听了没有,听到什么不重视。这只能说,这是传播上的意淫。

齐鲁晚报:虽然我们现有在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后面的路还很长。

王旭明: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关键是第二步,比第一步更加艰难,而且更加重要。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发言,谁发言,怎么发好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该怎么落实。不落实怎么办。

齐鲁晚报:能举个例子吗?

王旭明:很多新闻发布会,说了半天,里面没有新闻。因为新闻发布会的发布,决定权不在新闻发言人,而是在领导。如果碰到一个完全不懂新闻发布会的人,他又决定要开新闻发布会,那结果可想而知。

齐鲁晚报: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新闻发言人培训。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培训太重要了,不是纯粹讲理论,而是一个例子,一个解释,一个现场练习,我都觉得非常有必要。从我参加的几十场培训中,我深深感受到,不仅是基层,我倒是觉得高层,他们的新闻素养还是不高。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新闻发言人——不管是基层的还是高层的,真正成熟起来?

王旭明: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现在新闻发言人仍然是官员,而不是职业,这是我们新闻发言人与国外的最大不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要成熟起来,必须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白宫发言人未必适合中国”

齐鲁晚报:听说您崇拜朱镕基、吴仪,并说他们不是整天说正确的废话,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说的话百姓听得懂。您是否也希望有这样的领导,新闻发言人才会好做一些?

王旭明:朱镕基、吴仪是一种类型,不过,好领导有很多种类型。应当说,在党中央领导下,拥有开放、开明的心态,积极进取,不断跟上时代潮流,敢于创新的领导,不管是什么性格,那新闻发言人就好做。反之,就不好做。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想当一个好新闻发言人,领导很重要。

王旭明:(沉默片刻)怎么说呢……新闻发言人也许最终还是服务于领导的,领导不认可,新闻发言人不好做。

齐鲁晚报:您曾说过,“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全世界最难的新闻发言人”,是有感而发吗?

王旭明:第一,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没有媒体工作经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大都有此经验。第二,我们是行政制度很强大的国家,如果你的领导不重视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很难做。第三,现在国外新闻发布制度已经走了几十年,已经走上了制度化、职业化的道路,而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很多地方还不规范。特别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还不职业化,而是一级官员。那就更增加了难度。

齐鲁晚报:除此之外,对比一下国内外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劣?

(下转B05版)

人物简介

王旭明:北京人,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

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7月18日,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跟着王旭明看发言人培训

“至少我们的态度要诚恳”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您如何评价这次突发灾难中各部门的工作?”

“多年来……在上级机关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8月5日下午,北京朝阳区一个200人的大礼堂内,全场哄笑,只有王旭明摸着下巴,眼望“新闻发布会”的横幅,表情严肃。

这是北京市某区模拟的一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内的200多名学员未来都将走上该区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但面对“记者”的提问,该区文明办主任回答的“套话”,引来在场同事一致“哄笑”。

那一刻,所有在场官员都变成了听众和提问者,而面对此情,台上的四个模拟新闻发言人如坐针毡。

“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问什么,回答都是多年来……‘多年来’三个字属于新闻发布会忌讳的词,什么是多年来?几十年,还是几百年?这是教训,而且不要表扬和自我表扬,你这是参加事故发布会,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可以说点火就着了。但是感觉是所有部门表扬了一个遍,如何英勇救人,如何尽职尽责,如何领导关怀,就是没有问责的,而这个才是老百姓最想听的。”

王旭明作为点评嘉宾,立刻走上新闻发布点,“接管”了会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身上。

“新闻发言人是個很时尚、很热闹,也很有争议的职位,我的好朋友王勇平就深陷其中了。”王旭明继续点评。

这次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只是最近几十起邀请王旭明参加点评的培训会之一。

王旭明,曾是一个有个性也饱受争议的新闻发言人,他存在于官场5年已是奇迹,而离开这个岗位让他“欲哭无泪”。如今,已成商贾的王旭明,因为《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中国需要多少个温家宝》等多封针对新闻发

言人的公开信,让他重新走进公众视野。

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王旭明始终在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最真实的公开。但他承认,2004年,他组织召开了32次新闻发布会,几乎平均10天就要开一次,但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会都是可有可无的,质量、效率并不高。

“有些新闻发布会里没有新闻,只有官话。”王旭明说,选择了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什么是新闻发布会?是发布新闻的会,不是工作总结会,不是评优摆好会。首先看看发布了新闻没有。特别是事故后的新闻发布会,没有道歉、没有鞠躬、没有态度,这是我们很多发布会失败的原因,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会,一定要把道歉放在最前面。我干吗来了?我来表态来了。”

说这些话时,又让人想起了他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里的话:“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适……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

“新闻发言人重视新闻发布,但是我们很多领导不重视,比如在美国,最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白宫新闻发言人参与,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做不到,因此新闻发言人面对公众时,可打出的牌也不多。”

面对台下的学员,王旭明说,有时候很多东西新闻发言人都无法掌握,但至少我们的态度要诚恳。说这话时,王旭明显得很无奈。

有评论说,转换了角色的王旭明仍然不甘寂寞,成为这个聚光灯下职业的“案内人”。

“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表达言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王旭明说,“假如还可以选择,我不会再做新闻发言人。”

又想了片刻,他改口说:“也不一定。”